

任光椿◎著

五四洪波曲

WUSIHONGBOQU

下



《五四洪波曲》是著名作家任光椿的代表作之一，
与《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一起构成了
在当代文坛极具震撼力的“时代三部曲”。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五四洪波曲

(下)

任光椿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四章

1

海船在万山群岛间向西行驶，香港与澳门都在遥远的微凸的海平线上消失了，四面八方全是无边汹涌着的海浪。

傅斯年独自斜倚在船头的栏杆上，茫然地眺望着海上的云天，心中既有着一种解脱般的宁静，同时也有着一丝去国离乡的淡淡的惆怅。

他暗自庆幸自己终于从那可怕的混乱漩涡中跳脱出来了。

回想起数月来的生活，真象是一场充满惊涛骇浪的梦：天安门前的人潮，东交民巷口的激辩，赵家楼曹宅内的斗殴与纵火，三十多名同学被捕，郭钦光的不幸夭亡，数百名大学生的街头演说，大逮捕与自动投监的高潮，刺刀阴影下突然变得凄凉起来的大学校园，便衣警察阴阳怪气的脸色和警车恐怖刺耳的呼啸，追悼会上的控诉与呼号，还有席卷全国的声援与不断惊传的血腥的噩耗……真的是人心鼎沸，举国欲狂。

最令他痛心的是，在五四的翌日，当北大的同学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学，和是否应该立即举行总罢课，以反击北洋政府的镇压行动时，他只是说了一句：“眼前



还是营救被捕的同学要紧，罢课之事，对同学们自身的学业损失太大，还须要慎重考虑……”话音未落，就有人叫骂起来，甚至大打出手，在他的脸上狠狠地猛击了一拳。

这一拳把他的满怀豪情与满怀梦想都打得破灭了、粉碎了。

它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忿不可忍，当场就宣布退出了学生运动，并发誓从此以后决不再同那些“粗暴的妄人们”发生任何的联系。

在这之前，他的情绪原是很高昂的。他原是北京大学学生组织“雄辩会”的主角，《新潮》杂志的主笔，学生会的领袖。正是他带头组织了这次五四北京学生大游行；正是他担任了这次学生游行的总领队和总指挥；也正是他在天安门前宣读了北京学生界的宣言，甚至还亲自举着大旗，带领全体学生队伍，到赵家楼去示威。

爱国热情，追求和捍卫民主与人权的勇气，以及对公正美好的社会理想的憧憬，数月来一直鼓舞着他，使他情怀激烈，壮志凌云。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幻灭了。

他感到，这次五四运动，震惊中外，也许自有它光辉伟大划时代的可歌可泣的地方；然而置身其中，却也使他亲身感受到了它的消极的一面与它那光明中的黑暗。他觉得，象这样的群众运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完全为一种冲动的情绪所支配，是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又很难驾驭的。过度的狂躁极容易扭曲人们的良知与理性，而为少数野心家、钓名沽誉者、好事



之徒、不愿刻苦学习与劳作而又急于出人头地的人们所利用。他觉得，这样的躁动，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在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而其破坏性却很大。

正由于此，所以这次运动，刚刚起来，他就急流勇退，迅速地退缩了。运动还未结束，6月中旬，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山东，参加官费留学考试去了。

他哪里知道，仅仅是参加了一天的游行示威，却给他带来了许多的麻烦。

在山东省的官费留学考试中，他的成绩本来是很优异的。可是少数试官却认为他是“五四”游行的主角，是所谓激烈份子，便不拟录取。幸亏有一位在山东省教育厅工作的陈豫，热爱新才，据理力争，坚持以考试成绩为准，才使得他终于获得了留学的机会。

直到发榜后，他到上海整装待发时，还有几家蚊报，仍在散布流言蜚语，说他这次之所以能够去欧洲留学，完全是由于受到某家拥有日本股份之烟草公司的资助的结果。所有这些，都使他感到十分的懊恼。

现在，这一切总算过去了。站在这远离尘嚣的大海船上，望着茫茫横流的大海，他感到了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自由感与轻松。

他原本是一个热衷于中国旧学的人，是当时北京大学几位著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黄季刚等人的高足，他优游于诸子百家之林，沉潜于仪征学统之中，成绩卓著，才俊自赏，直到去年春天，因受到了陈独秀、胡适之等人的影响，才突然发生了



一种思想上的巨变，转向了新学，转向了文学革命，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位激进的新潮青年的魁首。从去年春天起，他就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过《文言合一草议》、《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谬误》等文章，在北大校园内外，引起了一阵阵轰动性的效应。今年，《新潮》创刊后，他又连续在《新潮》上发表了《去兵》、《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等政论，更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激进的倾向。现在，在聆听了美国博士杜威教授的多次讲学之后，在与他敬爱的老师胡适先生多次长谈之后，特别是在经过了这次五四大动荡的体验之后，他的思绪又有了新的变化了。他痛切地感到了自己近年来思想上的幼稚与盲目并为之深感不安。他深深懂得了盲目躁进，实在无益于社会与人生，唯有科学与教育，才能拯救国家与未来。他真的有了一种“识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他决心这次到欧洲去后，一定要抛弃过去那一切的浮躁，沉下心来，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文化，以便将来学成归来，振兴自己苦难中的故国。

他沉思着。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插在衣袋里，摸着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他知遭，这是临上船时，在上海街头书店里买的一本去年8月出版的第35号《每周评论》。那上面刊有一篇李大钊写给他的老师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题目叫做《再论问题与主义》。这篇文章，他上船后第一天就认真地读过了。他记得那里面有下面这样一段话，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李大钊是这样写的：



《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

他想，《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才几何时，新的分野就这样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争论就在同一营垒中展开了。这都是必需的吗？仲甫、适之、守常，都是他的老师，在他们的争论中，真理究竟在谁一方呢？民主主义与布尔扎维主义，究竟哪一种才是苦难中国的对症之药和回春之方？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到了迷惘彷徨。

这时候，突然从他的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呼叫声。他知道这是他的同学，这次千里海航，远涉重洋中的唯一的伴侣俞平伯来了。他将那本《每周评论》，深深地塞进了衣袋。他知道，俞平伯是一个满身浸透了诗与文学气质的人，对这类政论性的杂志他是不会感兴趣的。他听了俞平伯的音调，就知道这诗呆子肯定是又读到了什么西洋诗人的好诗了。他想，在这寂寞无聊的远洋航程上，离开那些恼人的政争，有这样一位可爱的诗友，一同读一些好诗，谈论谈论诗艺，也未尝不是一件消愁解闷的赏心乐事。于是，他理了理被海风吹乱的头发，回转身来，迎着俞平伯走去，准备着聆听这位学友的又一篇关于诗与美学的热情的议论。



是一个严寒的冬日，罗家伦正在嵩祝寺8号他的寓所里吃晚饭，忽然听到大门外胡同里一片喧哗，马嘶人唤；接着就见汪敬熙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冲着他连声喊道：

“志希，快走，北洋军警派了八支马队，包围了前门，抓你来了！”

罗家伦一听，立即放下碗筷，抓起那只早已准备好放在身旁的行李箱，拔脚便走，从寓所的后门，逃出了罗网。

根据北大学生会的集体决定和安排，他今夜要同张国焘一道，潜出永定门，乘夜班火车南下，到上海去，串连南方的同学们，再一次发起一场迫使北洋政府取消中日军事协定的战斗。他想，一定是政府的警探，已经侦获了这一动向，竟派了这样多的马队前来捉他，要不是有汪敬熙这个斋友及时赶来报信；要不是有那么一个平时鲜为人知的小小的后门，让他临难脱险，这一次他肯定就要同他的老师陈独秀一样身陷囹圄，误了大事了。

本来，自从北洋政府在学生运动和全国民众罢工罢市游行示威的压力下，拒绝了在有辱中华国格的巴黎和约上签字，撤掉了深受民众反对的曹、章、陆三大员的职务，释放了北京各大专学校所有被捕的学生，重新任命了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后，五四学生运动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了；他的战友傅斯年等一同发起这次学生运动的主将们，也都纷纷出国留学深



造去了。想不到在这样的時候，竟还会出现如此的险状，这一点是连罗家伦自己事先也未曾料到的。但是，他此刻既不畏惧，也不懊悔。他还是决心要冒险犯难，冲出罗网，到南方去，完成这个也许是这次学运的最后一项战斗任务。

在这次运动中，罗家伦是自始至终站在斗争前列的学运骨干之一。促成这次学运的三大思想阵地之一的《新潮》就是由他命名的。他同时又是另外两大思想阵地《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的积极撰稿人。还在五四之前，他就已经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驳胡先骕文学改良论》等那样具有很强战斗力和轰动性效应的文章。五四大游行之后不久，他又在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比孙中山早数月地首创了“五四运动”这一光辉的名词。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庄严地提出了五四所具有的“可以关系中国民族存亡”的“三大精神”，即：“一、学生牺牲的精神；二、社会制裁的精神；三、民族自决的精神”，昭示了这次运动的不朽的灵魂。

而且，这次五四大游行的北京学生宣言，也是由他执笔的。

他不仅是这次学运的宣传者，鼓吹者；同时又是战斗的实践者。

去年，1918年，当中日密约刚刚签订时，北大部分学生举行游行，包围新华门，冲击总统府的反日行动，就是由他和阮湘等几位北大同学率先发动和组织的。

这次五四大游行，他又是主要的发起者之一。五四那天，



他更是负责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与各国使馆人员进行谈判交涉的首席学生代表。

6月4日，北京军警大肆逮捕上街演说的学生，被捕人数高达八、九百人时，又是他在笼罩全城的恐怖气氛中，机警地潜出已被刺刀与机枪重重包围住的北大校园，甩掉一个又一个尾随跟踪的密探，以到北京日商凡善株式会社购书为名，通过日本邮电设施，向上海发出长篇电报，把北京军警大镇压大逮捕的详情，迅速传播到上海，传播到全国，激起席卷全国的声援浪潮，从而对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运动爆发后，北京政府也曾计划采用釜底抽薪之计，想用他们的御用学人胡仁源，代替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让胡氏用钱收买了一批新投考北大的学生，妄图依靠他们，占据北大学生会，夺取北大学生会的印鉴，然后以北大学生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举行仪式，欢迎胡仁源到校主政，以扑灭北京大学这片造成燎原之势的星火之源。可是，他们的这个阴谋，很快就被聪敏的学生们获悉了。学生会的主干们迅即采取行动，先发制人，组织了三百余名同学乘那些新投考来的被收买的学生正在北大第三院，集会审议如何夺取北大学生会“帅印”之时，将他们全部捉住，并在法科大礼堂设立公堂，连夜进行审判，迫使那些职业学生都——写了悔过书，盖上了手印，才将他们释放。当这次私设公堂的事件，受到政府严查追究时，他又是北大学生公推的唯一代表，与北大学生会聘请的律师刘崇祐一道，出庭辩护，终于打赢了这场诉讼，迫使北洋政府和胡



仁源等，不得不放弃他们宴图攫夺北大校长职务和学生会领导权的野心与尝试。

不久前，蔡元培见五四运动的目的多已达到，又迫于北大学生的一再恳请，答允回校视事时，他又是北大学生会，派往杭州去迎接蔡先生北上的学生代表之一。

想到这些，他为自己的行为深感自豪。近几个月来，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同斋学友傅斯年在这次学运中的表现感到不满。想当初，大家一起办雄辩会，办《新潮》杂志；一起在汉花园红楼内的“群言堂”与“饱无堂”内豪谈阔论；一起筹划、组织五四的大游行；一起在北京的大街上高呼口号并肩前进。那时候，他傅斯年的情怀是何等的激烈！意绪是何等的高昂啊！然而仅仅是一次的争吵，一拳的殴斗，一个小小的挫折，他就完全泄气万念俱灰了。他的五分钟的热度很快就冷却了。从此他就撒手而去，离开了众多的同学与战友，离开了正在苦难中艰难前进的运动，躲进了他的书斋；现在运动还未结束，激起这次学运的导火线之一的中日密约尚未取消，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公然枪杀抵制日货的中国民众的福州惨案刚刚发生，他竟挥袖而去，飘洋过海，到英伦留学去了。这难道是新青年应有的品格么？

不！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应该坚持到底，纵有万难千险，也终不悔止！

他从嵩祝寺8号的后门口逃出来后，首先到一个友人家里去，借了一副墨镜，一顶风帽；随后又到北大一院去，找到了张国焘，然后他们两个人便冒着北国严冬的寒风，沿着铁狮子



胡同，向永定门奔去。

待他们赶到永定门前时，入夜前的南下班车已经开走了，城门也已经闭关了。他们只好蜷缩在城厢内一株矮树丛中，坐候开城。

北京冬日的夜是酷寒的。从长城外大漠北呼啸而来的西伯利亚寒风，就象冰雪的利刃，触在人们的肌肤上时冷彻人的骨髓。他们偎坐在树丛下，毫无遮拦，只好把风帽拉得低低的，把脸埋进自己胸前的衣襟里，靠几层棉衣和年轻人火热的体温，抵御着那午夜严寒的侵袭。

他们都无法入睡。

“他妈的，北京冬天的这鬼天气，真冷。”罗家伦嘟哝了一句，把他的头更加深深地埋进了他的胸前。

“是啊，真冷。不过，想一想也没有什么。我想当年的列宁，当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东部去时，在那种鬼地方生活，肯定就会比我们这里更冷，更难受得多的。”张国焘的语调倒很乐观，不过，他也还是把他的头颈勾得低低的，把身子尽量缩成一团，却仍然驱不散周身的寒意。

罗家伦躲在厚厚的风帽和棉袍大襟里吃吃地笑了。他知道近来张国焘同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人，正跟从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颇倾向于苏俄的革命，果然，一开口就离不开列宁、马克思的圣名了。他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党却是不以为然的。他更倾向于西方的民主主义。只是，此时此刻，他对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先生和张国焘们却也并无敌意。他觉得，人各有志，应该是各行其道，不必



强求同一的。象现在这样，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是民主主义者，大家一道同行，共同努力，为反对一方侵略一方卖国的中日密约而斗争，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他俩就这样漫谈着，深思着，不知不觉间，竟冒着漫天的酷寒，朦胧地睡去。

等他们醒过来时，城门早已打开多时了，早班车也已经开走了。他俩只好相视大笑了一场，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冰雪和尘土，顶着如刀刺骨的寒风，踩着冰冻的铁轨，大踏步地走去，一直走到丰台，才赶上了由天津去上海的列车，登车南去。



第五章

1

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前，于1919年的春天，离开北京，陪送他的赴法勤工俭学的朋友们，沿京浦线乘火车南下的。

在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这件事情上，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当他于无意间，从他的恩师和未来的岳父杨怀中先生那里听到一个消息，知道有一笔前清户部核退给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款项，在前清继位之际经熊希龄、范源濂之手，还储蓄在俄国道胜银行中时，他便积极奔走，说服熊、范等人，将这笔款项取出，移作资助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之用。在熊希龄、范源濂、相怀中等三湘名流京华耆宿的支持下，他终于办成了这件好事，从而为众多的湖南学生得以实现赴法勤工俭学的愿望，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他把旅费全部都分发给了那些即将经上海乘海船去法国的湘籍同学们，而他自己却按捺不住心头的仰慕与渴望，独自一人在曲阜下了车，找了个小旅馆住下来，随后几天，就沉浸到他向往已久的孔林孔墓孔府孔庙等圣地之间瞻仰盘桓低回留连



去了。

他是爱结交朋友，喜欢群游的。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邀约任何的伙伴同行。他知道，在这新潮澎湃的时代，反旧排孔正是时髦之论。这时候，去邀约别的青年朋友来游孔颜故里，那肯定是要遭到旁人的误解、反对和讪笑的。所以，他这一次便毅然地选择了独行。他宁愿选择一次孤独，冒一冒被误解和讪笑的风险，也不愿放过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他是热爱中国文化传统的。尽管他也热爱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的思潮，但他对象孔子这样，在奠定中华文化传统之基础，形成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之主流，影响数千年中国文化之进程等方面，都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内心深处仍然怀着一种敬畏之情。他看重实践。他想，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于孔子的学说思想，你要肯定它也好，否定它也好，要发扬它也好，批判它也好，首先还是必须理解它，而理解只能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体验。他就把这次对孔里的游访，看成是一次实践，一次体验。要打孔家店，应该不应该，总得要逛一逛孔家店再说。他想，这样对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渊源，决定今后的方向，肯定是必要的，有好处的。

在曲阜，他几乎访遍了孔、孟、颜、曾的每一处遗迹，仔细研究了每一片碑刻，每一片坟林。十八年后，当他在长征路上，抽暇接待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向其谈到这一段经历时，他还曾不无自豪地，用一种显然是怀着眷恋与满足之情的口吻，对斯诺说：“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谒孔子的坟墓，我到了孔子的弟子洗脚的那条小溪



边，到了圣人幼年时所住的小镇。相传曲阜大成殿旁边有一棵古树，是孔子亲手栽种的。靠近替他所立的历史上有名的庙旁边，我居然看见这棵树了。我也在孔子有名的一个弟子——颜渊所曾经住过的河边停留过，并且也看见了孟子的出生地。”他还说：“最后我登过泰山，拜谒过孔子的墓。这些事情，在那时候，对于我，好象是除了遍游湖南以外的最大的成就。”

这些叙述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行踪与心态，说明了他对孔丘、孟轲这些我国古代圣贤的生平学行与事迹，从一开始就是熟悉的，即使在他于五四前夕在北京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那样的地方住了半年之后，在已经受到《新青年》、《新潮》所鼓吹的那些新思想的熏陶以及接触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之后，他对这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杰出代表者们也仍然是心仪的，有感情的。

他在曲阜畅游了几天，几乎花掉了他随身所带的为数不多的所有的盘缠，以致到了浦口以后，就几乎无钱购买前往上海的车票了。幸亏到上海后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位同乡前辈，曾经当过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在当时名气颇大的章士钊先生，慷慨地借给了他一笔钱，才把他从穷困窘迫的状态中挽救出来。

他在上海送走了徐特立、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瓚等这些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师友后，又接到了他的慈母因患喉蛾症病情严重已到长沙就医的急电。他爱母心切，心急如焚，就日夜兼程，赶回长沙来了。

他孑然一身孤零零地回到长沙，一下火车就赶忙去看望他最眷爱的母亲。幸亏他母亲的病经过医院抢救后，已经基本好



转，脱离了危险，他的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稍稍地宽慰了一些。

然而，摆在他面前的境况，却仍然是十分严峻的。

在上海，章士钊支助的那一笔钱，他早已把大部分都交给了那些初离国门，远去欧法，前途茫茫，亟需钱用的师友；留下的一点点零钱，在他从上海回到长沙的旅途上，也都用得差不多了。他重新又陷入了行囊羞涩、身无分文的窘境。且他环顾长沙。虽然景物依然，而人事全非，从前那些亲密的师友大都已经离去，故剑飘零，举目萧然，一时间几乎连一个寄身立足之处，都难以找到。

他从医院出来，先把简单的行囊寄放在医院的传达室里，然后便独自一人凄凄惨惨地在长沙街头蹀躞。他找了好几处故旧，却都没有着落。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使他第一次尝味了人生的苦味。最后幸亏在修业小学，找到了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年龄最小的一位同班同学周士钊，这才又一次绝处逢生，找到了一处栖身之地。

周世钊虽然年龄比毛泽东小许多岁，一师毕业后，也没有去北京武汉升学，就留在长沙任教，却也当上了一校的主事。这年轻的同学倒很慷慨，很念旧情。他一听说毛泽东眼前的处境，便立即答应让毛泽东留下来，并马上派学校的杂役，帮毛先生到医院去取回了行李。他要毛泽东从此就在修业小学住下，当一名历史教员，以后再谋高就。

毛泽东绝境遇故交，一时间既有了住处又有了工作，自然是又高兴又感谢的。从此他就在修业小学内，打扫一间房屋住